

“申遺”成功後的澳門文化政策反思

梁錦文* 勞日添**

澳門作為近代中西文化交流最重要的一個橋樑，幾百年來各種文化在此交匯，形成獨特的文化氣氛。2005年7月15日，“澳門歷史城區”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第29屆世界遺產委員會會議增列為世界文化遺產之一。

“澳門歷史城區”列為世界文化遺產之後，澳門市民理應更加重視和關心本身土地上的文化遺產，瞭解自己身處的城市，認清自己獨特的文化價值。然而，根據我們的觀察，澳門一般居民對申請世遺成功的喜悅並不如預期之深，因而成為本文研究的主要動機。

綜觀澳門的人口結構，95%以上的人口均為華人，非華裔血統的只佔少數。但是25座由歷史建築物與廣場所組成的“澳門歷史城區”，有多達20處為葡萄牙人400多年以來所興建的西方式建築，只有5處為具有中國文化特色的華南傳統建築。

就澳門居民的宗教信仰而言，信仰天主教與基督教的人數大概佔澳門總人口不到一成，傳統民間信仰仍然為大多數澳門人的精神信仰。但是澳門歷史城區的景點以屬天主教者(如大三巴)居多，甚至連仁慈堂也是；而民間宗教如媽閣廟、佛教如屬曹洞宗的普濟禪院等，都屬少數。顯然澳門歷史城區所表現的內容與澳門居民的人口組成、文化內涵以及宗教信仰仍然存有間隔，這種間隔一方面不利澳門作為中西文化交流橋樑、發揮聯繫中國大陸與西方世界交流的角色與任務，另一方面，也對澳門歷史城區對外作為推廣澳門特色、對內作為保存澳門歷史文化的重要基地造成了影響。

* 台灣暨南國際大學公共行政與政策學系副教授

** 台灣暨南國際大學公共行政與政策學系碩士生

再加上澳門本身是一個移民社會，不少居民都是1970年代以後自中國大陸移入，他們努力謀生之餘，是否因為對澳門認同不足而對申遺成功冷淡？

固然澳葡政府與特區政府先後也在法規與政策上都有因應之道，例如澳葡政府先後在1984年及1992年頒佈第56/84/M號與第83/92/M號法令，並在特區政府成立後繼續得到貫徹與執行；特區政府開設相關的培訓課程，培養相關人才，不斷壯大澳門文化保護隊伍，並將“愛護文物，傳承文化”的口號滲透到社區各個階層；2002年，特區政府舉辦《城市文化遺產的保護：澳門視野》國際學術研討會與文物大使培育計劃，企圖從不同的角度來推廣這些歷史文物。

然而，“澳門歷史城區”之所以能成為世界文化遺產，是建立在澳門400多年具有特色的歷史文化之上。在特區政府將2006年定為“澳門世界遺產年”之際，實在有需要思考如何在推廣澳門成功申遺的背後，探討如何培養澳門人對澳門歷史文化的認識，從而深化澳門人對“澳門歷史城區”作為世界文化遺產的認識與保護，並培養關懷本土的精神，愛惜這片土地。

一、從族群角度分析澳門世遺景點

認同的觀念來自許多不同的因素，這些因素都會影響到澳門居民如何看待世遺景點？首先，認同最重要的因素是來自族群。不同族群對代表其本身的任何文化特色都會有一種特殊的認同感，也是其本身引以為傲的地方。也就是說，華人對代表華人、屬於華人的文化景點或其他事物會有強烈的認同；相對的是，歐洲人對歐洲文化也必會有較為強烈的認同。

澳門的族群大致可以分為三類：第一類是華人。他們包括原是澳門的居民，但大多數都是1949年以後陸續由中國大陸廣東、福建等地遷居至澳門的人士。這些人士也因其遷居澳門的年代不同而存在四代

至一代之差別。其實，他們對澳門的認同也因世代不同而有所分別。在澳門三代以上的居民對澳門的認同較大，反而對中國大陸，尤其是其閩粵本鄉的鄉情感較淡。相反，在澳門二代以下的便對其本鄉的情感較濃。雖然如此，不過在澳門的華人對中華文化多會有一種很親切的認同，這是不可否認的。

澳門第二個族群便是在外文文獻中所稱的“澳門人”(Macanese)，澳門本地人稱之為土生葡人。他們的祖先原是葡萄牙人，最早約在400多年前由葡國經非洲好望角(Cape of Good Hope)、印度果阿(Goa)、馬來半島等地來到澳門。在400多年的歷史中，不同世代的他們分別與非洲人、印度人、馬來人以及華人通婚，混血程度之複雜使他們形成一個獨立族群。由於種種原因，他們也切斷了與葡萄牙本鄉的一切根源，沒法再回到其本鄉生活。然而，大致而言，他們的文化認同方式仍是以西方文化為主。¹

澳門第三個族群便是外國人。他們由於工作關係來自不同的國家，當然也有許多是澳葡時代留下來的葡萄牙人。與土生葡人不同的是，他們很清楚其本身的國籍，也與其本鄉有實質上的聯繫，也就是說，他們可能不會在澳門終老。當然這些人的認同也因國籍不同而有所不同，但基本上他們的認同是以西方文化為主。

作為世界文化遺產的“澳門歷史城區”，其實是有25處景點。澳門文化局公佈的資料顯示，這些景點如果以中西式建築來分，則中式建築只有媽閣廟、鄭家大屋、三街會館(關帝廟)、盧家大屋、哪吒廟5處；反而，西式建築則有港務局大樓等20處(表一)，中、西建築比例是1:4。也就是說，澳門的“世遺”景點，絕大部份(80%)都是西式建築，而中式建築似乎是“點綴式”的。

1. 有關“土生葡人”的研究，可參閱 João de Pina Cabral & Nelson Lourenço 著，陳潔瑩譯：“風中之竹：一項有關澳門土生族群身分以及世代更替的研究”，載《行政》雜誌，第21期，1993年9月，第693-715頁；趙燕芳：“土生葡人：澳門一個重要的、獨特的居民階層—美好前景在展現”，載《行政》雜誌，第23期，1994年5月，第199-203頁。

表一 澳門“世遺”景點中西式建築一覽表

西式建築	港務局大樓、亞婆井前地、聖老楞佐教堂、聖若瑟修院及聖堂、崗頂前地、崗頂劇院、何東圖書館大樓、聖奧斯定教堂、民政總署大樓、議事亭前地、仁慈堂大樓、大堂(主教座堂)、玫瑰堂、大三巴牌坊、舊城牆遺址、大炮台、聖安多尼教堂、東方基金會會址、基督教墳場、東望洋炮台(包括聖母雪地殿聖堂及燈塔)。	共20處
中式建築	媽閣廟、鄭家大屋、三街會館(關帝廟)、盧家大屋、哪吒廟。	共5處

資料來源：澳門文化局，《澳門世界遺產資料夾》，<http://www.macauheritage.net/Education/> (19, April, 2006).

然而，從表二觀察澳門的居民，主要是佔了95%以上的華人，土生葡人只佔1.78%，而外國人也只佔2.15%。換言之，澳門最大族群是華人，而非華人人士只佔了4%左右。

表二 澳門居民族群一覽表

族群	人數	比例
華人	416,353	95.66 %
土生葡人	7,773*	1.78 %
外國人	9,338	2.15 %
總人口	435,235**	100.00%

資料來源：澳門統計暨普查局，《2001年人口普查》，第138頁。

* 這裡的葡籍土生，是根據2001年人口普查得出，泛指具有中國及葡國；中國、葡國及其他；葡國以及葡國及其他血統之人士。

** 統計局最新公佈人口數至2005年12月31日為止，為48萬8千人。《澳門日報》，2006年03月30日，第1版。

表三 澳門世遺景點與居民比例合併表

	世遺景點比例	人口比例
西式/外國人	80%	3.93%
中式/華人	20%	95.66 %

倘若將表一與表二加以合併成表三，可以觀察到絕大多數為西式建築的世遺景點(80%)，與以華人為主要人口的澳門居民比例(95.66%)是成相反的趨勢，也就是說，世遺景點主要的西式建築，並不是在澳門主要族群生活等活動的原有景點。由此可見，二者矛盾之處，是澳門居民對申請世遺成功後的認同沒有增加的原因，也是澳門在推動世遺未來必須努力的方向。

二、從宗教角度分析澳門世遺景點

宗教信仰也是居民認同的主要途徑。猶太人對屬於猶太教的事物有更深刻的認同，天主教徒對天主教事物、佛教徒對佛教事物都會有較為親切的認同，此乃不言可喻的。

澳門的宗教大致可以分為天主教、基督教、佛教、道教、伊斯蘭教、巴哈伊教以及民間信仰等，其中巴哈伊教與伊斯蘭教等所佔的比例甚少²。天主教與基督教屬於由西方傳入、而在澳門的信徒人口也不少的宗教。天主教於1561年傳至澳門，1576年成立教區，曾為西方文化往中國、日本以及東南亞傳播的重要基地。天主教澳門教區共有6個堂區，4個傳教區，各種機構36所，學校35間。現有80餘位神父及修士與180餘名修女在教區內參加工作。澳門教區現有大約28000名教徒，其中有17000人左右為華人。³

2. 有關澳門宗教的研究，可參閱鄭煒明、黃啟臣著：《澳門宗教》（澳門：澳門基金會，1994年）。

3. 《澳門教區簡介》，<http://www.serra-club.org.mo/dioceseorg.htm>。（2006年04月30日）

基督教最初由馬禮遜 (Robert Morrison) 牧師於1808年傳入澳門。⁴目前在澳門有十多個宗派，其中較大的如浸信會聖公會和中華基督教會等。目前有堂會牧師20人左右，宣教士、傳道員約80人；教堂54間、福音機構18間、學校9所、學生8000多人；並有世界宣明會澳門分會等社會慈善服務機構10間。⁵

佛教於唐咸通年間(860~872)傳入廣東，隨即傳入澳門。澳門的佛教包括了禪宗、淨土宗等，再加上華人對宗教的混淆，也常將道教與民間宗教與佛教結合，例如澳門著名的媽閣廟，原本是供奉民間宗教的媽祖，但目前在廟中亦供奉佛教的觀音等，因此澳門的佛教、道教與民間宗教是混而為一的。目前澳門廣義的佛教僧尼有40人左右、寺院40餘間，代表性的有普濟禪院、菩提禪院、媽閣廟以及蓮峰廟等。1997年始成立澳門佛教總會，以為統籌佛教事務的機構。⁶

澳門世遺景點，若以宗教角度來分，可以得出天主教的景點9處、基督新教者共1處，而民間宗教者共2處；其他景點包括政府機構2處、華人組織1處、華人民宅2處、廣場2處、葡人民宅2處、葡人防衛設施3處以及其他1處(表四)。如果將民間宗教算是佛教，再加上華人商業組織的三街會館以關帝廟來認定者，也只共為3處。相對的天主教本身便有9處，再將東望洋燈塔的雪地聖母教堂算為天主教者，共為10處。也就是說，如果僅以天主教、基督教以及廣義的佛教來分，則澳門世遺景點則分別為10處(40%)、1處(4%)以及3處(12%)。倘本研究以廣義的基督宗教(即天主教加上基督新教)與廣義的佛教作為分類，則澳門世遺的景點分別是11處與3處，分別佔44%及12%，可見代表基督宗教的世遺景點遠比廣義的佛教為多，其中光是天主教的景點便佔了40%。

4. 有關馬禮遜將基督教傳入澳門的歷史，可參閱馬禮遜夫人 (Mrs. Elizabeth Morrison) 編、顧長聲譯：《馬禮遜回憶錄》(Memories of the Life and Labours of Robert Morrison)，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年。

5. <http://www.macaadata.com/macau/affairs/bf06.html>.

6. Ibid.

表四 澳門“世遺”景點的宗教性質一覽表

天主教	大三巴、仁慈堂、聖老楞佐教堂、聖若瑟修院及聖堂、聖奧斯定教堂、大堂(主教座堂)、玫瑰堂、聖安多尼教堂、崗頂前地	共9處
基督教	基督教墳場	共1處
民間宗教	媽閣廟、哪吒廟	共2處
政府機構	民政總署大樓、港務局大樓	共2處
華人組織與民間宗教	三街會館(關帝廟)	共1處
華人民宅	鄭家大屋、盧家大屋	共2處
廣場	亞婆井前地、議事亭前地	共2處
葡人民宅	何東圖書館大樓、東方基金會	共2處
葡人防衛設施	舊城牆遺址、大炮台、東望洋炮台(包括聖母雪地殿聖堂及燈塔)	共3處
其他	崗頂劇院	共1處

資料來源：澳門文化局，《澳門世界遺產資料夾》，in <http://www.macauheritage.net/Education/>, (19, April, 2006).

大致而言，在澳門宗教人口中，華人傾向廣義的佛教，而外國人以及土生葡人則傾向天主教與基督教。然而由於後二者對澳門教育的影響，因而有許多在這些學校畢業或就讀的學生會因此而領洗，加入天主教或基督教的行列。但是目前大致上華人仍是以廣義的佛教為主。

目前澳門的天主教徒為28000人左右，佔澳門人口5.74%；基督教徒為5000人左右，佔1.02%；而廣義的佛教徒則是390,400人左右，佔80.00%。若將天主教與基督教合而為一，則信仰基督的基督教徒人數則佔澳門總人口的6.76%，與廣義佛教徒的80%相比，仍是天壤之別。

表五 澳門居民宗教信仰一覽表

宗教	人數	比例
天主教	28,000	5.74%
基督教	5,000	1.02%
廣義的佛教	390,400	80.00%

資料來源：《澳門教區簡介》，<http://www.serra-club.org.mo/dioceseorg.htm>。至於基督新教的教友，一說為不足 5000 人，如《澳門總覽》（第二版），澳門：澳門基金會，1996 年，第 503 頁；一說為人口的百分之一，如“澳門基督教前瞻”，《時代論壇》，第 856 期，2004 年 1 月 25 日），<http://www.m-ccc.org/m-infm/Mo/hist/MacauChurchFuture.htm> 所說者。

若將前述之表四與表五合併為表六，則可以清楚地發現澳門“世遺”景點與澳門居民宗教信仰的反差現象。其中，除基督教信徒人口佔 1.02% 以及代表其信仰的“世遺”景點比例為 4.00% 尚算正比外，其他天主教與佛教則呈反比現象。在澳門號稱擁有 80.00% 信徒的佛教，其在“世遺”之代表景點只有 12.00%，相反的是，在澳門只有 5.74% 之天主教徒，其代表的“世遺”景點共有 44.00%。這也是澳門世遺景點與澳門居民的另一個矛盾現象。

表六 澳門世遺景點與澳門居民宗教信仰比較表

宗教	世遺代表景點比例	信徒人口比例
天主教	44.00%	5.74%
基督教	4.00%	1.02%
廣義的佛教	12.00%	80.00%

三、從移民世代角度來分析澳門世遺景點

無庸置疑的是，澳門本身是一個移民社會，暫且不論前述的土生葡人，連佔 95% 以上的中國人本身都是移民社會。目前在澳門的華人大多是由廣東、福建移至澳門的人士。然而，他們亦因為移入的時間

不同而對澳門本身的認同有程度上的不同。固然澳門本身有世居的華人如盧廉若家族、鄭觀應家族等，但人數不多。他們移居澳門大多是民國以後的事，因為中國大陸在民國之後分別在軍閥割據、北伐、國共戰爭、日本侵華、“三反五反”、“文革”，以及改革開放等不同時期的大變動，使得原本居住在粵閩兩地的人往澳門移入，成為目前澳門居民的主流。⁷

但是，不同時期移入澳門的居民，由於世代不同，以及在澳門居住時期的長短而對澳門本身的認同程度便有很大的差異。例如，1949年以前移入澳門者，在澳門居住的世代至今業有三代以上，許多第二代業已在澳門出生長大，由於“生於斯、長於斯”，他們對澳門的認同甚強；到了第三代時，他們不只是“生於斯、長於斯”，也從第二代，甚至第一代的父祖輩口中得知澳門過去五、六十年以來的點滴，加深了他們對澳門的認同，也加深了他們對澳門認同的程度。

反之，如果是“文革”以後移居到澳門的人士，他們在澳門最多只有兩代，也就是說父母親由中國大陸移入，其子女或在澳門出生、或生在大陸，在澳門長大的。對於這種後期的移民，第一代的移民只在澳門居留了20年左右，對澳門的認同不會太多，第二代雖然或許在澳門“土生土長”，他們由於缺乏第一代父輩人士對澳門認知，對澳門認同的程度也就大大減少了。

況且後期移居澳門的人士，由於澳門因社會或城市規劃的變遷，許多景點亦不復存在，造成他們根本不知澳門過去的事物。例如利維旅酒店（今中國銀行新馬路分行現址）是常掛在老一輩澳門人口頭的景點，但對新一輩的移民來說，則甚至連名字都不知道的。此外，如銅馬像等亦是，如果不知它的存在，也不會知新馬路正式名稱之由來。甚至連民政總署前門“忠貞的議會”（Leal Senado）等字樣也取消了，當然也難以了解1580—1640年葡萄牙為西班牙併吞的那段歷史。因此，更不可能對其後輩娓娓道來。

7. 有關澳門的人口變化，可參閱鄭天祥、粟明鮮：“澳門人口四百年初探”，載《澳門社會學學會學報：濠鏡》，第3期，1988年4月，第65-68頁。

再檢視澳門世遺景點，屬15世紀者共1處、16世紀者共6處、17世紀者共4處、18世紀者共6處、19世紀者共8處，此外亞婆井前地的年代不可考，但也是15-17世紀時便已形成的(表七)。這些景點並沒有20世紀的產物，也就是說，目前一般澳門人認為是觀光景點的澳氹大橋、葡京酒店、金沙娛樂場、漁人碼頭、觀音像(皇朝廣場)，並不是澳門世遺的景點。換言之，澳門“世遺”景點並不是現代的產物，更不是1970年代後來澳的居民所熟悉的。

況且正如前述，澳門世遺景點除了偏重西方以及天主教外，其實它們本身多少具有“知識貴族”的味道，對於澳門一般普羅大眾而言，“遠東第一所西式大學”、“遠東第一所社會福利機構”、“遠東第一所西式醫院”等都不是他們關心的事物，更遑論要將它們作為認同的對象。⁸

表七 澳門世遺景點年代一覽表

15世紀(1400~1499)	媽閣廟	共1處
16世紀(1500~1599)	聖老楞佐教堂、聖奧斯定教堂、玫瑰堂、仁慈堂、大三巴、聖安多尼教堂	共6處
17世紀(1600~1699)	大堂(主教座堂)、舊城牆遺址、大炮台、東望洋炮台(教堂部分)	共4處
18世紀(1700~1799)	民政總署大樓、議事亭前地、聖若瑟修院及聖堂、崗頂前地、三街會館(關帝廟)、東方基金會會址	共6處

8. 此三處即大三巴、仁慈堂以及辣菲爾(白馬行)醫院(即今澳門葡國領事館處)。

19世紀(1800~1899)	鄭家大屋、港務局大樓、崗頂劇院、何東圖書館大樓、盧家大屋、哪吒廟、基督教墳場、東望洋炮台(燈塔部分)	共8處
20世紀(1900~1949)	無	共0處
不明(難以定義)	亞婆井前地	共1處

四、澳門文物保護教育的現況與努力方向

近年來，特區政府大力加強文物保護的宣傳推廣及教育工作，無論是向國際推介澳門文物，還是在本地區推行的全民普及文物知識活動，都取得了良好的成績。

在研究發展上，從2001年舉辦的《近代亞洲建築網絡研討會》、2002年召開的《城市文化遺產的保護—澳門視野》國際學術研討會，使澳門的文物保護工作得以與世界文物保護先進國家交流，借鑒外國的經驗。另外，諸如設立“歷史文化報告考察獎”，出版《文化雜誌》，資助出版澳門研究的書籍，以及開設澳門文物修復課程等，都對澳門的文物保護與教育工作提供了積極推動作用。

在大眾推廣上，“文物大使”的培訓，不僅是培養作為宣傳澳門歷史文化的代言人。⁹更重要的是，在澳門的青年人口中，植下了種子，對澳門未來的文化推廣工作具有深遠影響。另外，還有一系列面向澳門中學生的比賽，如故事創作比賽、攝影比賽、壁報設計比賽以及面向市民大眾的“澳門文物之旅”路線設計比賽等等，活動可謂相當多元化。但是，這樣的推廣策略可能只涉及部分有參與的市民，如何更主動、更廣泛地向澳門市民、學生推廣澳門的文物保護工作呢？

文物的保存與推廣是一項長期的事業，必須作長遠打算，尤其是如何在市民的熱情過後繼續發展相關工作，相信應該成為相關部門認真思考的問題。

9. <http://www.macaoheritage.net/YHA/indexC.asp>.

是故，本文認為，文物保護工作必須從歷史教育著手。由於歷史因素，在澳門中學教育中，澳門歷史長期被置於邊緣地位。對澳門歷史，一般市民同樣所知有限。隨著“澳門歷史城區”成功申報成為世界文化遺產，澳門歷史文物的研究再次受到關注與重視。然而，澳門的中學對於澳門歷史的教育工作仍然因學校、老師認知的不同而有所差異；澳門歷史或許成為歷史課的一部分被放進正式課程當中，又或許被置於週末的課外活動時間，作為非正式課程的一部分，而更甚者，相關議題可能還沒有被納入顯著課程。這當然不利於作為世界遺產的“澳門歷史城區”的推廣與教育工作。政府相關部門與教育界應設法加強學生對澳門400多年來中西文化交流史的認識，只有澳門居民了解澳門獨特的歷史文化，才能建立對澳門歷史文化價值的認同與自豪感，並賦予真正的、發自內心的意義與愛護，只有這樣，澳門的歷史文化保護與推廣工作，才能永續經營。

五、反思與建議

如前所述，澳門“世遺”景點與澳門居民在族群、宗教信仰以及移民世代等方面都出現了反差。由於這些反差，導致澳門居民對“世遺”景點的認同有某種程度的落差，甚至不認為這些景點是代表他們的地方，因而對澳門申報“世遺”成功沒有多少從內心發出的雀躍。

近十年來澳門政府，不論是澳葡政府或是特區政府，都有旺盛的企圖心，希望將澳門身為“東西文化交匯點”的歷史優點，予以推廣。從申請“世遺”成功的角度而言，這種推廣業在世界上見到功效。但是，澳門居民是否真的產生由“東西文化交匯點”而衍生出對澳門本身的驕傲，似乎仍言之過早。

考其原因，主要是這次澳門申請成為“世遺”的景點，在族群、宗教與世代的角度都與澳門居民的構成形成反差。造成這些反差最重要的原因是華人本身對歷史建築的輕忽。華人雖然佔澳門主流人口結構，但是許多屬於華人的廟宇、海關、營地等建築，其歷史可與大三巴媲美，但是華人從來沒有加以保存的概念。例如，目前關前正街與關前後街，便是明末清初的稅館，也就是當時中國四大海關之一的粵

海關真正的所在地。¹⁰ 粵海關雖然名在廣州，但因外人不能入城，致海關在澳門運作。¹¹ 附近的營地大街即當時協助守備海關的營地，而草堆街則是外人報關前要將遠涉重洋的貨物予以曬乾之處，草堆便是墊貨的工具。這些屬於華人的建築，卻因華人不善管理，以及由於“貧窮感” (Sense of Poverty) 而加以改建，致遺址也是以高樓大廈呈現，無法成為文化遺產。

而這些華人建築之所以沒法真正保存下來，也因為中國政府從明末至今經歷了不少朝代的興衰，國內戰亂頻繁，連基本上的安定都沒有，更遑論文化保護？況且對歷代中國政府而言，澳門世居邊陲，更不是中國政府發展的重點。

或稱澳門本身為業在1887年清政府與葡國簽訂《中葡和好通商條約》時，便已在葡國的管轄範圍內，至1999年始回歸到中國政府內，因此這段期間澳門華人的建築或文化遺產應由澳葡政府加以保存。然而華人之建築與文化並不是葡萄牙人所能了解的，況且正如前述，澳葡政府治理澳門期間，主要的公務員便是前述的土生葡人，而不是由葡國派來的官員，由於土生葡人一般學養不高，是故很難對文化，尤其是精緻文化有所了解，對中國人文化更不容易有保存之意欲。

對在澳門居住的華人而言，他們大多數都是因戰亂關係由中國大陸移入的粵閩人士，他們原本在中國大陸本鄉時就沒有多少財產，或者因戰亂等因素而失去了那些財產，到了澳門只能胼手胝足的為生計而活，有一溫飽已經不錯，所以更沒法去照顧文物。

不過相對於西方人士而言，華人雖號稱文化之邦，但深層結構也並不如此，因為所謂文化之邦只適應於知識份子階層，但歷史上這一

10. 印光任、張汝霖原著，趙春晨校注：《澳門記略校注》，澳門：澳門文化司署，1992年，第94頁；當時中國四大海關為：江海關（雲台山）、浙海關（寧波）、閩海關（漳州）與粵海關（廣州）。見王之春，《國朝通商始末記》，卷五，台北：文海出版社，1968年，第5-7頁。

11. 因此也造成1856年第二次英法聯軍時外人要求的“廣州入城事件”。蔣廷黻：《近代中國外交史料輯要》，上卷，台北：商務印書館，1977年，第167頁；五知（謝興堯）：《鴉片戰爭後廣州入城交涉》，台北：文海出版社，第1頁。

階層的人數其實甚少。反而是一般普羅的庶民在人數上相較甚多。再加上中國歷來政權都有“愚民化”傾向，一般華人對文物之保存更不關心。¹²

世界遺產的保護是一項長遠的事業，“澳門歷史城區”被列入《世界遺產名錄》的同時，也意味著澳門歷史文物保護工作進入一個新的里程碑，只有繼續加強與深化推廣工作，並將澳門歷史文物的保護與推廣置於澳門歷史文化的前提下，澳門歷史文化的保護工作才能更完善，並為世界各國所肯定。

然而，澳門真的是“東西文化交流”的地方，至少目前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認定“澳門歷史城區”為世界文化遺產，則可見在硬體上的確是受到肯定的。但是筆者認為在軟體上也有許多可以進步的空間。

首先，加強澳門本身的歷史教育，使得同樣生活在澳門這片土地上的華人與西人都能對澳門本身歷史有更深的認識，尤其是加強彼此的認識，使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澳門人士都可以不分華洋，都可以了解這些“世遺”景點在澳門歷史上的意義。

次者，利用電視、網際網路等傳播媒體，將前述的教育予以普遍化，使得澳門居民對早已耳熟能詳的“世遺”景點有更多的認識。例如澳門居民絕大多都知道大三巴、仁慈堂以及辣菲爾（白馬行）醫院，但是卻是甚少人知道它們分別是遠東第一間西式大學、社會福利機構以及西式醫院。這種不斷透過推廣教育等工作，便是澳門特區政府未來應予以重視。

最後也是最重要的是，文化是一種由人類本身所發出的集體代表，它是歷史的產物。但是世界上許多珍貴的文化遺產，都因政治或經濟因素而加以摧毀或破壞，這都是人類文化的浩劫。澳門歷史文化遺產固然有許多屬於西方的、天主教的，但是也不應將之以西方文化、西方宗教等理由而加以破壞，更不能因為政治因素或意識形態而任意改動或毀壞，畢竟這些都是人類本身經歷不少年代努力的成果。

12. 犖犖大者如秦之焚書坑儒、漢董仲舒之獨尊儒術、明之八股文以及1966年開始的“文化大革命”等，都是由政府所推動的“愚民化”政策。

作為“東西文化交流地”的澳門，其歷史城區之所以成為世界文化遺產，似乎是那些歷史建築物，但是，對於澳門人而言，“東西文化交流”的精神涵義到底是甚麼？筆者在此建議的是，那是否為“互為容忍、互為交流”的廣闊胸襟？如果沒有這廣闊胸襟，可以虛懷若谷，納人之長以補己之短，僅是那些歷史建築物又有何種意義？

